

吉林文史資料

第 15 輯

《吉林文史資料》編輯部
中國民主建國會吉林省委員會 編輯
吉林省工商業聯合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吉林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编辑说明

本辑是由《吉林文史资料》编辑部与民建吉林省委员会、吉林省工商联共同编辑的吉林工商史料专辑。所刊史料，多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或亲见亲闻，内容翔实、具体，具有可读性，可供了解和研究工商史、工商政策和工商企业经营管理参考借鉴之用。

京东刘家与吉林牛家均为旧中国东北的巨商，在东三省及京津一带有较大的影响，是我省有代表性的民族工商业者。刘家经营的长春益发合成为东北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之一。牛子厚还在北京创办“喜连成科班”，对我国京剧的早期发展做了贡献。梅兰芳、马连良等许多京剧舞台上的名角，都是这个科班里的高徒。永吉缸窑、吉林裕华染织厂，都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争生存、求发展，饱经沧桑。“九·一八”事变前的长春金融市场，其复杂混乱的程度为国内外所罕见，几个省、几个国家的二十余种货币都在这里流通、汇兑。本辑虽是工商史料，但对其他各界读者，也值得一阅。

本辑编辑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

目 录

京东刘家与长春益发合	贾 涛 刘益旺	(1)
一 京东刘家的发迹		(3)
二 长春益发合的创设与发展		(11)
三 “九·一八”后的益发合与京东刘家		(47)
四 益发合的公私合营与刘家现状		(77)
忆先父吉林巨商牛子厚	牛淑章	(89)
(一) 牛家的家世		(89)
(二) 牛子厚的经商		(94)
(三) “乐善好施”		(109)
(四) 喜连成科班		(111)
东北陶业的摇篮—永吉缸窑	永吉县政协	(119)
吉林裕华织染工厂的创立与发展	许洪山	(133)
“九·一八”事变前长春金融市场的回忆	杨有义	(149)
吉林省传统食品史料拾零		(160)
李连贵熏肉大饼		(160)
“真不同”酱菜		(161)
“太盛园”白肉血肠		(162)

京东刘家与长春益发合

贾 涛 刘益旺

前 言

《京东刘家与长春益发合》是根据我在1962年编写的《长春益发合史料初稿》补充、整理、改写的。这个史料，曾以《长春益发合兴衰始末》的篇名在《长春文史资料》第九期发表。现在益旺同志又饶有兴致的把刘氏家族的一些情况与本人在益发合企业一段亲身经历补入史料，作为现在的名目出刊，当使原史料生辉。

刘益旺同志原是益发合企业董事兼副经理，是解放后益发合企业负责人之一，并曾因益发合企业之代表性而出任长春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任秘书长，后因故离职。由他修改补充是合适的，我预祝成功。在这里我想把原成书的经过和供稿人等向读者作一介绍。

1959年，我在长春市民建宣教处任干事，市工商联在全联搞史料任务精神鼓舞下，决定在长春编写益发合史料，抽调我和赵中和同志作这项工作。长春益发合虽然经历近百年，业务旁及粮秣大车店、钱庄、茶店、百货店、油厂、粉厂、米厂、布厂，并曾经营出口业务，从业人员最多达3,000余人，有其典型性，但年代久远，书面资料多已遗失，不少

当事人均已不在，我们主要依靠在长的刘姓股东——即以后安排为吉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的刘次玄同志，刘家情况主要是他供给，和在益发合从业多年并靠他护厂到解放的陈景新同志，企业情况主要靠他供给。另外又走访了原益发银行经理李墨林、刘冠英，原哈尔滨益发合经理安化庭，以及出口部主任谢汀锡等同志，并广泛地征求了益发合制粉厂党组织、工会与老职工的意见，还参考了省博物馆、市图书馆供给的《益发合万金合同》以及其他资料整理而成。此间曾蒙吉林大学经济系1959年级全体同学，特别是孔经纬老师的大力协助，先后历经三载，三易其稿，于1962年问世。孰料史料印发之日，恰是我离开市联之时，此后二十余年颠沛流离，其他东西均接连抛去，但此手稿未忍离身，未料我归长后经市工商联推荐，市政协首予刊载，今又拟再次付印。思今抚昔，供给材料的同志大多作古，参与工作的赵中和与打印本史料的杨瑞舫同志也相继离世，如知昔日所冀，今两度付印，当慰亡灵于地下。我当年三十五岁之身，今成花甲之人，斯身已欲东山土，尚可存葬土之用，自己亦可含笑于人间。我深知，不打倒“四人帮”我无今日，无党的英明政策，此史料亦难一再刊出。此时此刻，我衷心地向省、市政协各级领导致以谢意。

我对经济史是外行，当时的目的是多保存原有史料，以待经济学者之研究，但水平有限，挂一漏万，此次经益旺同志补充、整理，当补此遗憾。益旺同志书成之后，要我过目修改，不过是对原作者的礼貌而已，我对此表示感谢。常言读史使人明智，我们从这本史料中也许可以找到一些借鉴的。

贾 涛 1986年12月1日

一 京东刘家的发迹

京 东 刘 家

长春益发合是东北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京东刘家是它的出资人。一般不明底细的人，往往把长春益发合与京东刘家混为一谈，其实，益发合仅仅是京东刘家所经营的一百多处发字号企业当中的一个企业，益发合的东家仁中合堂也仅仅是京东刘家的一支。京东第一家之名产生于清末光绪年间，它的鼎盛时期也在光绪年间，而那时益发合只不过是由农安泰发合和长春东发合共同出资在长春西岭子开设的一个大车店而已。等到益发合进入全盛时期，京东刘家已经由盛而衰了。因益发合而发大财的，也仅仅是京东刘家的一支仁中合堂罢了。京东刘家本是商人、官僚、地主三位一体，而益发合则发展成为一个近代化的民族资本企业。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京东刘家，居北京以东的乐亭县汀流河镇刘石各庄。一般称刘家为乐亭刘家或汀流河刘家。因刘家富冠京东，故而有“京东第一家”之称。简称“京东刘家”。

刘家祖籍是山西省大同府。元末明初之际，明太祖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伐，当时在河北省东部和北部一带很多老百姓，被元朝胁迫随蒙古军队撤到长城以北，造成了内地户籍锐减，土地荒芜。燕王朱棣称帝，迁都北京后，下令向这一带地区移民，刘家就是这次由大同迁到乐亭的。

汀流河原是一条河，是大清河的支流，还曾有过航运，后来干涸了，在那里形成了一个集镇，也沿用了汀流河的名

子。刘石各庄距汀流河镇不足二华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村内就有二百多户人家，绝大多数都姓刘。

据现在所知，京东刘家的祖先，可以上溯到清朝乾隆（1736年至1795年）初年的刘福。

刘福生一子，名新亭（或“新庭”）。刘新亭生一子，名如娥，又叫刘老坤。其后起名子就按辈排字了。刘如娥（即刘老坤）有三个儿子，即刘兆京、刘兆年和刘兆熊。他们哥三个分家后，分别起了堂号，即长门合德堂，次门合义堂、三门保合堂，后人把他们称为老三股。这是刘氏家族有堂号的开始。

刘兆京的儿子刘灏，孙子刘应麒，三代单传，堂号一直叫合德堂。

刘兆年，字凤鸣，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奎，字星辉，起堂号为仁合堂，有五子，即长子应枢（字梦斗）、次子名不详（字剑秋）、三子应藩（字翰宸）、四子应轸（字济苍）、五子应翼（字筱辉）。刘凤鸣次子刘鋈，字仲平，起堂号为中合堂，有四子，即长子应隆（字毅侯）、次子应毓（字慧田，即刘益旺之父）、三子应溥（字笠农）、四子应凯（字绮园）。

刘兆熊，字玉衡，有七个儿子，即刘楨、刘煜、刘培、刘浚、刘炬、刘坦、刘燮。七弟兄分家后，长门仍叫保合堂，其余均另起堂号，依次为会合堂、元合堂、亨合堂、利合堂、贞合堂和庆合堂，因住在刘家院落的北侧，所以叫做北七堂，也叫北堂。

应字辈以下是益字辈，再以下是国字辈。

三位一体

刘家发家的过程，就是商人、官僚、地主三位一体形成的过程。

当益发合创设时，刘家经营商业已经有了五代的历史。远在清朝乾隆初年，刘福已有土地十数亩。至乾隆末年，刘福之子刘新亭一面经营土地，一面就开始了经商活动——开设钱桌子。当时的钱桌子是在集市上放一张桌子兑换制钱、银两和金银首饰，是摊贩性质。初期，刘家利用冬闲季节，叫伙计（长工）挑挑儿到关外兴城、北镇等地卖些日用品，后来就从关内挑些锄板、大布、锄头等物到关外卖掉，买些烟、麻、油、靛等物。这种贸易是季节性的行商性质。以后，商品交换日益增多，就用火车去关外贸易。

刘新亭之子刘如娥（刘老坤）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他于1805年（清嘉庆十年）左右，在刘石各庄开设老二合商号，成为座商。但因当时运输全靠大车，上冻后方能行车，化冻后即难以行走，故仍带有季节性。由于经商获利，到嘉庆末年，刘家的土地已增至数十亩，可以称得起土财主了。土财主往往受官府的气。为了改变有财无势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发家致富，刘如娥（刘老坤）给三个儿子做了分工，叫长子刘北京在家经营土地，次子刘凤鸣经营商业，三子刘玉衡读书求仕。刘凤鸣进一步发展了商业经营，在老二合的基础上，先后于刘石各庄开设了双发合、成发合。这两家杂货店开设的目的，主要是供给刘家需要的日用品，也和本村进行交易。又在滦县的饒城（现在河北省滦南县县政府所在地）开设了德发合杂货铺，从事钱粮行活动。到了道光年

间，德发合的营业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由于商业利润和地租剥削相结合，刘家的财富与日俱增。后来，刘玉衡考中了举人。清朝的举人，在外县，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了，人们要称呼老爷，与县太爷平起平坐。至此，刘家算是结束了有财无势的局面。

刘玉衡可谓官运亨通。1860年（清咸丰十一年），为镇压宋景诗起义军，刘家曾向清朝政府献洋枪三千只，名之曰“报效国家”。在宋景诗起义军被镇压之后，刘玉衡就成为清室要员文祥的师爷（相当于秘书）。1861年曾跟文祥在热河朝阳镇三座塔，镇压了才宝善领导的起义军。1865年（清同治四年）三月，又跟文祥到长春打过马傻子，担任军需、军法等职。剿匪恰是官军发财之良机，据说刘玉衡一个人分得的财物就铸成二十二块金砖。他回京后，接到达官贵人，和军机大臣大学士张之万、庆亲王及宦官李莲英都有来往。到了同治年间，刘玉衡的长子刘桢考中了举人。光绪初年，三子刘培考中了会元，四子刘浚考中了举人。后来，七子刘坦也考中了举人。自此，刘家门上悬挂了“同胞三科举”的巨匾。刘坦曾当过御前侍卫和颐和园电灯房提调，又曾与振贝子拜干兄弟，认庆亲王为干老子。外界传说，京东刘家是慈禧太后的干儿子，可能就是从此而来。建立民国后，刘坦还当过交通银行总裁。刘玉衡的五子刘炬是拔贡，北洋军阀时期，当过国会议员。乐亭县官上任，无不到刘家拜访。刘家的官僚身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刘家官僚身份的发展，促进了刘家的商业经营，也使土地骤增。到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刘家老三股分家的前夕，刘家土地已达54顷（5,400亩）之多，这在地少人多的

乐亭县，已是稀有的大地主了。刘家的商号也发展到30余处。例如，由双发合开设了兴发合、双发栈、双发铁、双发瓷店。刘家又开设了成发合和裕发合，由成发合和裕发合又开设源发合瓷店、源发合茶庄、裕发酒局。德发合在稻地镇开设了西德发合和聚发合钱庄。这些商号的经营方法是刘家乡居不问柜事，企业由领东掌柜的负责。德发合又向关外发展，在农安县开设了泰发合杂货铺，泰发合又在长春开设了东发合大车店。这时，刘家不算其它财产，仅库存就有制钱360万吊之多（合白银约2万两）。有人说，京东刘家是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随着刘家财势的日增，家庭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刘玉衡自以为有功于家庭，在家随意挥霍，并暗自积蓄。刘凤鸣怕家财被刘玉衡吞没，特别是手中有些积蓄，打算发展商业又不得施展，于是在1889年（光绪十五年）将家产分为三股。同时各起堂号，长门合德堂，次门合义堂，三门保合堂，这就是老三股的来源。54顷土地各股均分17顷，庄园劈为三份，商号也按三股均分。长门合德堂分得双发合系统，次门合义堂分得德发合系统，三门保合堂分得成发合系统。从此，刘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开始分化，长门合德堂以坐食地租为主兼营商业，三门保合堂主要在官场活动，次门合义堂以经商为主，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民族资本家。合义堂经营的益发合逐渐发展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之一。这就是乐亭刘家家史中有名的“老三股分家”。

截止到清末，长门合德堂拥有商号十六处，设在刘石各庄的有双发合老柜、兴发合、合德堂药店，设在汀流河镇的有双发铁、双发栈、双发瓷柜，设在乐亭县城的有会发合下

杂货铺、瑞发合银号、同发合绸庄、鸿发合绸庄、隆发合绸庄、汇记下杂货铺，设在迁安县建昌营的有俊发合当铺，设在山海关的有济发合当铺，设在长春的有发记银号、涌发合烧锅。

三门保合堂拥有商号 21 处，设在汀流河镇的有森发合木局，设在乐亭县城的有裕发合钱庄、源发合瓷店、源发合茶庄、裕发酒局、文发合油坊、庆发合粮栈，设在滦县僊城的有合记银号、慎发合当铺，设在滦县城内的有万发合下杂货铺，设在开原的有晋发合、礼发合，设在营口的有厚发合银号、厚发合银炉布柜、志发合银号、英发合银号，设在长春的有金发合银号、成发合长柜、文发合长柜，设在北京的有裕发合、成发合。

益发合股东合义堂在益发合创设前经营商号十九处，设在刘石各庄的有合义药局，设在汀流河镇的有义记商号（后改为义丰长，又改为恒发合），设在稻地镇的有西德发，设在乐亭县城的有聚发合，设在滦县僊城镇的有德发合，设在滦县红桥镇的有永发当，设在北京的有公义合（后归中合堂）。西德发又在通江口创设翠发合粮栈，在开原创设翠发合，在辽宁省田庄也创设了翠发合。聚发合又在乐亭县城创设广发合当铺，在昌黎创设增发合钱庄，在乐亭县城创设春发合海味店。德发合又在僊城创设正发合烧锅，在长春创设东发合，在农安创设泰发合（1931 年迁长春）。东发合又开设了东发钱庄和东发北，泰发合又在农安开设了泰发当，在长春开设了益发合大车店。上述商号除德发合、西德发、义记、永发合和合义药局为刘凤鸣创办，其余都是刘凤鸣的长子刘星辉创办的。

胜似王府

有人说，汀流河刘家的宅院与北京的王府一样，这话并不夸张。它虽然没有汉白玉和琉璃瓦，其建筑规模却胜过王府。

刘家宅院占刘石各庄正街路北的大半面。原合义堂的院落是刘家宅院中最早、最好的建筑物，称为“老宅子”。合义堂分家时分给了中合堂。刘益旺就是在这座宅院里降生的，一直住到八岁。

合义堂老宅是1859年（清咸丰十年）经刘凤鸣手修建的，花了100万吊制钱。整个宅院分为正宅、东外宅和西外宅三个主要部分。正宅有三座七进大院（即三座由七间正房与东西各三间厢房合成的大院）。正房和厢房都是出廊的，并有曲廊相连接。房前有海棠树、丁香花和牡丹池，方砖铺地，有两口大荷花缸。东外宅主要有帐房、厨房、粮仓、猪圈、鸡舍、马厩等；西外宅有花园、小客厅、花厅、书斋等。刘家主要的建筑物都是磨砖对缝，红松木料。据说是因为怕人说刘家想盖王府，所以柱子不油红色而油黑色。刘家建筑物上的木雕、砖雕和石雕，又超过了北京的王府。其他各堂的房屋亦大致相仿。利合堂的大花园最好，有山有水，还养着仙鹤和梅花鹿。

刘家院落的围墙足有三丈高，各堂都雇佣护院的，他们多数是河北沧州人，武功好，枪法准，平时护院，外出保镖。其实土匪是不绑刘家的票的。他们知道刘家的势力大，得罪了刘家，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和平共处，一旦缺钱

少枪没子弹了，向刘家告告帮，刘家还不会叫他们空手的。

“会元事件”与“状元事件”

首先说一说“会元事件”。

尽管刘家挂上了“同胞三科举”的巨匾，其实，刘玉衡的这几个儿子，都是纨绔子弟，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刘培的举人功名就是雇人替考的，又雇人替他去京城参加会试，没有想到不但中了进士，而且考了个第一名。会试的第一名叫会元。这下子可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家中接到报单后，刘玉衡确实高人一等，他不以为喜，反而立即召集关内外各地掌柜的到乐亭县，不顾商号的存亡，而勒令抽调各柜难以负担的巨款，齐聚乐亭县，由多路镖局联合押运去京，以备案发之需。果不出所料，代笔人事后向人卖弄说：“刘某是我替考的，如果知道能考个会元，我自己报名好了。”听者有心，便告发了。慈禧太后非常生气，下旨严查。此时镖车已到北京，这笔巨款便成了活动费用，上下左右都买通了，连告发人也买通了。当官方找到告发人调查时，告发人说：“这不过是道听途说”。官官相护，谁也不愿意深究，便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上报。

再说一说“状元事件”。

刘星辉、刘仲平那一辈，是刘家的鼎盛时期，也是生活最腐化的时期。到那时，刘家的男人小时是少爷，长大便是老爷，完全过的是寄生生活。纳妾之风在那一辈人中最盛。保合堂刘楨在北京作官时，与一个旗籍公子哥争夺一个“花国状元”（被评选为“第一名”的妓女），雇了几个暴徒把那“状元”抢走，并失手打死了那个公子哥。此事轰动北京

城，于是九门贴告示，捉拿凶手。起初，刘桢把“状元”隐藏在京东四牌楼附近租赁的一所四合院里，后来见到事态严重，便把她放回了妓馆。官府当然要想从她口中追查凶手的下落，她只承认曾有过争风吃醋的事，但把这次抢她的人说成是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她一直不知道那人的姓名。官府怎肯干休，结果那“状元”受尽了酷刑，始终一口咬定此案与刘桢无关。刘家又花了很多很多银子，上上下下都买通了，就连死者的家属也用钱疏通好了，才算把此案了结。又过了一段时间，风浪平息了，刘桢还是把那“状元”接到了乐亭县刘石各庄，纳为侍妾。从先后发生的这两件事中，可见当时刘家之一斑。

二 长春益发合的创设与发展

益发合的创设

长春益发合创设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本为大车店。最初，益发合并非京东刘家直接经营，而是由农安泰发合和长春东发合两号共同出资开设，各在益发合有六个半份子。益发合的利润归泰发合、东发合两号掌柜的直接分劈。泰发合、东发合的利润交给滦县倭城镇的德发合，刘家直接分劈德发合的利润。所以，当时刘家对益发合来说并不是“财东”，而是“号东”。因为，刘家开设滦县倭城德发合，德发合开设农安泰发合，泰发合开设长春东发合，泰发合和东发合又合资开设益发合，益发合与刘家之间尚隔着两

层台阶。

为什么要创设益发合？据《益发合股份有限公司沿革概况》记载：“……盖彼时铁路未兴，物资运输胥赖畜力大车，大车店为供应客商宿膳、及代理购销货物之生意也。”这段记载仅仅说明创设原因的一部分，还有其他因素要在叙述益发合创设的过程中加以说明。

关内滦县倭城镇的德发合是京东刘家开设的老商号之一，它的营业发展较快。若想向北京、天津发展，难以和那里的商人竞争，乐亭、滦县地近山海关，自然就要向东北地区开辟贸易。光绪初年，德发合的交换活动已经逐步向关外发展，如兴城、锦州，最远到长春、农安一带。1886年（光绪十二年）农安县的义和当因给德发合代售货物，欠贷款10万8千吊，无力偿还，刘家就派龙老玉到农安把义和当的房屋、铺垫、货物一并兑下来，留用了原企业人员，在义和当的地址，以10万8千吊为资金，开设了泰发合杂货铺，兼营油坊、烧锅、当铺和专门从事迷信品制作的码子房。这是刘家在东北地区开设的第一个企业。1889年（光绪十五年），泰发合在长春西岭开设了东发合车店。同年，京东刘家老三股分家，商号也按三股均分，次门合义堂刘凤鸣分得德发合系统，当然农安泰发合、长春东发合也就属于合义堂这一支了。

刘凤鸣死后，合义堂分家，分别另起堂号为仁合堂和中合堂，合称仁中合堂，原合义堂的商号并未分劈，仅把商号的股本分做两等份，柜事由刘星辉掌管。刘星辉发展的企业大多相继废业，只有农安泰发合和长春东发合稍有发展。这时泰发合、东发合两号在分红方面与德发合产生了矛盾。当时泰发合、东发合两号利润的分配方法是东七西三，即

将利润的十分之七交给德发合，其余的十分之三由两号掌柜们分配。掌柜们分到的红利不多，因此大家都提议由两号出资开设一号。当时农安泰发合的经理傅春礼也是憐城德发合的经理，也是泰发合、东发合两号的总管，人们把傅春礼叫做刘家的“钦差”（当时人们把代理东家经营企业的人叫“钦差”），他为了自己多得些红利，又想用多办几处商号的办法来取得东家的好感，便正式向刘星辉提出由泰发合、东发合两号出资在长春开设一处大车店的建议。刘星辉认为不用刘家拿本钱就可以重组一号，何乐而不为，便欣然同意了。于是，由傅春礼和东发合的何经理（名不详）经手，由两号抽些铺垫、资金，合为4万8千吊，在长春西门脸双桥子外西岭子（即今长春儿童公园处）东发合附近租下房屋，聘请原万亿栈经理韩杏林为领东掌柜的，又从两号抽出几名熟悉业务的人，在1892年（光绪十八年）4月1日开始营业，起字号叫益发合。这就是长春益发合的创设。

所以要选择在长春这个地方创设益发合大车店，当然是有道理的。

长春地方原来是蒙古郭尔罗斯旗的游牧地，因汉族流民日多，1800年（清嘉庆五年）才设长春厅，厅址在伊通边门附近的新立城。1825年（道光五年），长春厅移建衙署于比较适中的宽城子，这就是现在的长春。因此，长春也叫宽城子。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迫使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两国签订《天津条约》，根据条约，东北的牛庄（后改为营口）于1861年开辟为通商口岸。沙皇俄国的魔掌也伸入东北。在外国资本侵入的刺激下，东北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初步发展。由关内各地和国外输入的工业品、手工业品，

从营口沿辽河运往东北各地，东三省出产的农产、土特产经营口运销关内和国外。北满的农副产品都向南运输，在通江口（亦称通江子，在今辽宁省昌图县）上船，从营口出口。长春位于南北满交界处，土质肥沃，地当要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当时长春周围的双阳、伊通等十二县盛产农副产品，但缺少工业品，因而不仅农民到城里出卖粮食及烟、麻、油、靛，关内、营口各地也拉来农具、海味、洋货等物到长春进行贸易。所以，长春不仅是附近农副产品的集中销售市场，又是商业重镇。当时由于贸易增加，运输力量也增强了，火车未通，每天有近5000辆大车在长春集聚，粮食交易十分兴旺，因而大批粮秣大车店和粮栈应运而生。

当时大车店的性质与现在不同，主要业务不是为了方便农民，而是代理购销货物，即以招待货东为主。大车店供给食宿，成为招引客商的一种手段，因而不仅准备宴席酒肴，有时竟不收费。只要商人老客儿住在大车店内，大车店就派人往外汇货（即代理客人向外推销货物）或代为购买，买卖成交之后，从中得佣钱（即手续费）。所以，当时的大车店包括代理店的业务，到秋后也囤积粮食成批出售，因而也具有粮栈的性质。当时益发合的营业范围也是这样。

益发合在创设时，从业人员30人左右，设有客房、马厩及仓库。院中可容大车100辆。在韩杏林以下有帐桌掌柜的管理财务，管院子的掌柜的管理事务和应酬客人，上市掌柜的负责商品信息与供销，在各地老客儿货车到达后，即到城内代为汇货或购买。掌柜的以下有劳金和年轻的（相当于学徒）。归管院子掌柜的管理的院工叫院心伙计。由于大车运输有季节性的限制，因而大车店的生意也带有季节性。为